

# 海上絲銀之路貿易中的爛板銀元 及對中國貨幣金融的影響

戴建兵

**[摘要]** 中國銀元發展過程中，先是外國銀元在境內流通，然後由於信用以及金融中介營利等因素，導致中國市場對外國銀元進行戳記，銀元上的戳記多了，就成爛板銀元。它的出現突出了政府和市場（民間）的貨幣關係、相互的競爭，以及貨幣本身的規律性發展，這在中國貨幣及金融發展史中極具金融學、貨幣學及錢幣學意義。

**[關鍵詞]** 絲銀之路 爛板銀元 貨幣 金融

## 一、絲銀之路的貨幣

14、15世紀，西歐商品經濟的發展使社會需要更多的金銀貨幣，而此時歐洲的貴金屬礦產資源已近枯竭，同時，歐洲在與中國和印度的通商過程中，也輸出了大量的白銀，交易媒介成為困擾其經濟的主要問題，歐洲必須尋找新航路，發現新的金銀礦，以維持其經濟發展，這亦自然是一些冒險者的夢想。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美洲成為16—18世紀世界最大的白銀產地，西班牙所屬美洲殖民地的大批銀礦的開採都在16世紀，最著名的秘魯波多西（Potosi）銀礦也在16世紀80年代達到開採的鼎盛期。波多西在1581—1609年的20年中，平均年產白銀254,000公斤，約合明制6,809,000餘兩，佔當時全世界產銀總額的逾60%。相比起世界的銀蘊藏量，中國的白銀礦藏極少。1571年，西班牙佔領馬尼拉，菲律賓殖民地成為著名的貿易交易地。此時中國國內的生產水平大幅提升，對白銀需求日益增長。經中外海商之手，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棉布等源源不絕地運往西方，白銀滾滾流入中國。<sup>①</sup>這一條新的海上貿易之路，後人稱為“絲銀之路”。由於貿易量巨大，西班牙曾規定從墨西哥出航的船隻不許裝運超過25萬比索（Mexican Peso）的銀幣，<sup>②</sup>而交易的媒介主要是西屬美洲銀幣。

西班牙銀元（Spanish Carolus dollar）或稱加羅拉銀元，俗稱本洋，是1535—1821年西班牙所鑄的銀幣。早年流入中國沿海口岸如廣州、廈門等地的西班牙銀元，是由菲律賓輾轉流入的。自

**作者簡介：**戴建兵，河北師範大學教授、歷史學博士。石家莊 050024

<sup>①</sup> 王裕巽：《明代白銀國內開採與國外流入數額試考》，《中國錢幣》（北京）1998年第3期。

<sup>②</sup> 陳健鷹：《關於西班牙銀元流入中國的若干問題》，《福建錢幣》（福州）1994年第3、4期合刊。

中國與歐洲各國直接貿易後，本洋主要從廣州口岸流入。西班牙銀元最初輸入中國時，由於重量穩定，質量優良，為人們所接受。

不同的美洲西班牙銀幣大體分成三個時期製造，一是16世紀至1732年，為打製的不規則的手工銀幣，稱為COB（卡伯）<sup>①</sup>，二是1732年始至1772年間鑄造的老雙柱，分三世（1732—1741）、五世（1742—1746）、六世（1747—1759）、後三世（1760—1771）機製幣，正面為西班牙國徽、雙柱，下為水波紋，使用八進位，8 REAL（里爾）相當於一元，重約25—27克，近似於中國庫平七錢二分，這一重量成為日後銀元重量的慣例。此外還有4R、2R、1R幾種小銀元，在墨西哥、秘魯、玻利維亞不同鑄地均有標記，又稱老雙柱；三是1772年至1825年鑄造的西班牙國王頭像銀幣，分為卡洛斯三世（1772—1788）、四世（1789—1808）和斐迪南七世（1809—1821），即新雙柱、人像雙柱，正面以國王肖像為圖案，背面為雙柱圖案，中國民間稱其為佛洋，面值為8R、4R、2R、1R、1/2R、1/4R幾種。1825年墨西哥獨立後，西班牙開始在本國內鑄造銀元。

墨西哥獨立革命時，1823年（道光三年）停鑄雙柱銀元，自鑄墨西哥銀元，因幣面為鷹，中國人稱其為鷹洋，或寫為英洋。其面值、直徑、重量和成色與西班牙銀元一脈相承。直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墨西哥由於實行金本位而停止鑄造銀幣。墨西哥銀元早在道光九年（1829）就流入廣東，因其錢幣圖案而被稱為蝙蝠，<sup>②</sup>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更是大量流入。墨西哥鷹洋製作水平高、成色好，道光三十年（1850）左右，就開始在一些地區代替“雙柱”在中國流通。

明末清初，除西班牙銀元在中國大量流通外，荷蘭、葡萄牙等國銀元也流入中國。很快地，南方的廣東、福建、江西、浙江、江蘇、安徽和湖南省東南部地區逐漸成為銀元流通的區域。

世界經濟發展，白銀產量日豐，清中後期列強開始建立金本位制度，白銀在這些國家漸成普通商品，因此，這些國家開始為其國內的白銀尋找出路，向中國輸出銀幣，加緊向中國投資。

1867年4月1日（同治六年），港英當局以第四號法案形式公佈，批准港元為自由流通的法幣。<sup>③</sup>兩次發行的一元銀幣雖然重量不一，但大小、重量與墨西哥銀元基本一致，共鑄造了約2,000,000元。由於其含銀量僅為90%，中國商人還在檢認銀兩的成色，故並未立即接受而造成滯銷。銀元滯銷導致香港造幣廠停鑄，後造幣機器出售給日本。<sup>④</sup>英國又在印度孟買鑄造了貿易銀元，因其圖案而被俗稱站人，共鑄造了153,360,000元，<sup>⑤</sup>主要用於對華貿易，其中有三分之一流入中國。

同治七年（1868），日本將英國在香港設置的造幣機器全部買回後，在大阪設立國家造幣廠鑄造銀幣，圖案為龍，人稱日本龍洋。1878年銀價下跌，日本更是大量鑄幣，1871—1897年共鑄165,000,000枚，其中輸出國外者達110,000,000枚，<sup>⑥</sup>多在中國流通，甲午戰爭中更是大量運來

① Saran Singh, *The Encyclopaedia of The Coins of Malaysia Singapore and Brunei, 1400—1967*, Kuala Lumpur: Malaysia Numismatic Society Publication, 1996, p. 540.

② 伍連炎：《外國銀元大量流入廣東史跡》，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等編：《銀海縱橫——近代廣東金融》，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③ 《北華捷報》，1866年7月30日。

④ Saran Singh, *The Encyclopaedia of The Coins of Malaysia Singapore and Brunei, 1400—1967*, Kuala Lumpur: Malaysia Numismatic Society Publication, 1996, p. 548.

⑤ 伍連炎：《外國銀元大量流入廣東史跡》，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等編：《銀海縱橫——近代廣東金融》，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⑥ [美]耿愛德（Edward Kann）：《中國貨幣論》，蔡受百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第145頁。

中國以支撐戰費。光緒二十四年（1898），日本宣佈廢除其在國內的貨幣價值，僅充當為一般銀塊，但在中國仍然流通。<sup>①</sup>

同治年間，美國銀元開始流入中國。<sup>②</sup>光緒十九年（1893），美國又鑄造貿易銀元，專供遠東貿易之用。<sup>③</sup>而從光緒二十年（1894）開始，美國計劃使用墨西哥銀幣的模子鑄造鷹洋，以替美國落基山（Rocky Mountain）的產銀尋找出路，同時將所鑄銀元運入中國流通，<sup>④</sup>但由於墨西哥政府不想將這種利益讓給美國人，計劃最終作罷。

光緒五年（1879），法國外交大臣照會清朝出使英法大臣曾紀澤，要求清廷准許法國在安南鑄的銀元在清國流通，並准中國海關收用。中國政府拒絕在海關收用這種銀幣，但准許其在民間流通。<sup>⑤</sup>光緒二十年（1894），法國東方匯理銀行（Banque De L'Indochine）開始發行法國銀幣，每枚重41.667克，成色含純銀千分之九百。1895—1903年間的鑄造總數為5,500萬枚，其中部分流入中國，俗稱法光。這種銀幣成色較高，受到普遍歡迎。法國修築滇越鐵路的中國雲南段工程時，工資支出法國銀元750萬元。以後，滇越鐵路的客運、貨運均以法光計算，先後向中國輸入法光約1,700萬元，其中部分由雲南流入廣西。<sup>⑥</sup>

## 二、外國銀元在中國的流通

明末時期，外國銀元已經流入中國，當時使用範圍很小，限在粵、閩兩省的福州、廣州等外貿比較發達的少數地方使用。

浙江蕭山汪輝祖嘉慶元年（1796）所撰的《病榻夢痕錄》記述：在他40歲以前，浙江省蕭山地方還沒有番銀名稱，“有人自閩、粵攜回者，號稱洋錢，市中不甚行也”。汪輝祖生於雍正六年（1728），到他40歲時應為乾隆三十三年（1768），才有洋錢自閩粵流入浙江蕭山一帶，但到30年後嘉慶元年（1796），番銀在浙江的使用已比庫銀為廣了。<sup>⑦</sup>

鴉片戰爭前夕，洋錢在國內流通已見廣泛。道光十五年閏六月（1835）兩江總督陶澍、江蘇巡撫林則徐在有關洋銀流轉的奏摺中說：“惟洋銀行用情形，各省本不相同。其始祇用於粵、閩，漸次乃及於江、浙。江蘇本居腹地，市肆買賣，行用較多……其浙江、閩、粵海船攜帶洋銀來至上海置買蘇、松貨物者，往往有之，如將蘇省洋銀運載往南，則又百不得一。蓋浙江洋銀價值向比閩、粵等省為昂，緣其物本由南來，輾轉流行愈遠，則作價愈貴。浙江貴於閩、粵，江蘇又貴於浙江。”<sup>⑧</sup>

① 《北華捷報》，1898年9月12日。

② 《申報》，同治十二年七月十八日。

③ 葉世昌、潘連貴：《中國古近代金融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61頁。

④ 《字林西報》，1894年4月27日；《北華捷報》，1894年5月18日。

⑤ 《曾惠敏遺集》卷一《法國鑄錢諮請轉奏緣由書》；另可見《清季外交史料》卷十五。另見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金融史料組編：《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中華書局，1964年，第720—722頁。

⑥ 鄭家度編：《廣西近百年貨幣史》，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6頁。

⑦ 張國輝：《中國金融通史》第二卷，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年，第81頁。

⑧ 《兩江總督陶澍、江蘇巡撫林則徐折》，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金融史料組編：《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44—45頁。

鴉片戰爭後，洋錢在華流通更加廣泛。1843年上海對外開放通商時，人們發現上海與寧波、蘇州、杭州一樣，早已通行西班牙銀元了。大多數做小買賣的店鋪都按銀元交易，但豆類、棉花、棉布等大宗土產貿易仍用銀兩計算。上海已經是銀元和元寶（銀錠）同時通用。<sup>①</sup>

英國議會在1847、1848年的《藍皮書》中稱：“銀元在（中國）下述各省自由流通：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浙江、江蘇、安徽和湖南的南部和東部。爛板銀元的流通，幾乎全限於廣東、福建和江西。殘缺的小銀元則為廣東的許多地方所愛。”<sup>②</sup>

### 三、外國銀元流通種類的區域性

銀元進入中國時，中國並沒有相應的貨幣本位，更沒有本位幣，仍然流通銀錠，而銀錠的流通要依靠銀兩的重量和成色這二個基本要素決定，故當時人們在交易時都要用一個小秤（戥子）對銀錠進行稱量。與此同時，明代人對銀的成色有了“紋銀”的概念，對其成色有基本要求。但明時已有大量的假銀和低銀，時人陳懷軒《新刻江湖杜騙術》一書反映了明朝民間的種種騙術，尤其是在使用銀兩方面，<sup>③</sup>這就給了市場中介，也就是當時的金融從業者提供了很多機會。

首先，他們依銀元不同成色，對銀元進行了區域性的分割流通，這是當時封建經濟使然，也是封建的金融從業利益的來源。例如，1855年，英國駐上海領事羅伯遜（Robertson Daniel Brooke）說：“到這時（筆者按：1855年）為止，西班牙銀幣還只在廣州港流通，北方港口（筆者按：指廣州以北的口岸）對它不甚瞭解，因而在開始時墨西哥銀元由於成色較純，兌換西班牙銀幣時有升水；但是從廣州來的通曉外語的人和買辦們把他們對西班牙銀元的偏愛帶到了上海，並與過去同廣州市場有過關係從而知道這種硬幣的內地茶商和絲商聯繫，很快地使它流行了起來，於是不久之後，它就像在廣州一樣成為本港的通貨……最近兩三年來，西班牙銀元對墨西哥銀元的升水，已達到30—40%，只要這種硬幣繼續作為本港通貨，就很難說這種升水要升到哪一點才會停止。”<sup>④</sup>但是很快，即1863年，美國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ns）在論述當年上海的金融狀況時寫道：“本地人過去愛好西班牙銀元，現在已經轉而愛好整潔的墨西哥銀元了。”怡和洋行的檔案記載1869年絲茶區的生絲價格是“按照墨西哥銀元確定的”。<sup>⑤</sup>

這種以對銀元種類進行的區分從而獲得兌換或不同幣種之間的差價的情況，後來在上海等地仍然通行。即是到了民國初年時，上海金融市場仍然爭論着要在錢莊和市場上使用哪種銀元為基本本位幣，但這只對於大的金融從業者如票號、洋行、錢莊有利，而小的兌換業等只有靠其他的手法賺錢了，這就是爛板銀元出現的根本原因——當然，最表象的原因是為防偽。一如舊時錢莊從業者的回憶：“‘從古至今都有假幣。我給你們講個假幣的故事吧。’父親意味深長地說。‘我小時候在一家私人錢莊當小伙計，一天有一個中年人走進了我們的錢莊憑銀票取了50枚銀

① 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金融史料組編：《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44、45頁。

② 《北華捷報》，1856年4月19日。

③ [明]張應俞：《新刻江湖杜騙術》，紀凡譯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④ 《英國駐滬領事1855年度報告》，李必樟編譯：《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張仲禮校訂，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3年，第11頁。

⑤ 張國輝：《中國金融通史》第二卷，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年，第86頁。

圓，不一會又回來了，說用不着了再存上，掌櫃的打開了這摺銀圓仔細地查看，發現有4枚銀圓是假的，不讓存，那人生氣地說，剛從你這取的，還沒出你家大門就假了，假也是你們的事。掌櫃的非常鄭重地說，凡是我們錢莊的錢全打上了圈子戳，你看，就這四枚沒有，沒有也不是問題，可是你這四枚是假銀圓。那人恢恢溜溜地拿着錢走了。’原來這小小的戳記竟然起到防騙反假的作用。”<sup>①</sup>

#### 四、爛板銀元

明末清初外國銀元大量流入中國後，尤其是墨西哥銀元的影響日益擴大，很快地，南方的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浙江、江蘇、安徽和湖南的東部南部逐漸成為銀元流通的區域。過去商人的習慣做法是把收到的外來銀元毫不猶豫地投入熔爐中，重新鑄成他們所熟悉的寶銀，如嘉慶年間福建“稅皆納番銀，傾銷交庫”。<sup>②</sup>但是墨西哥銀元成色穩定、製作精美，再加上交易便利，已越來越被人們所接受——不過這種接受不是一下就完成的，而是要經歷一個過程——鑑定機構會對銀元的製造和成色進行鑑定，並在銀元上加蓋戳記，從而成為一種特殊銀元“爛板”。從爛板銀元身上，依稀可見國人對外國洋銀態度的轉變，而從另一角度而言，這也是日後中國各地出現銀兩成色保證機構公估局業務的前身。

中國早期墨西哥銀元有兩種流通模式，一是被重新融化成銀錠，一是在銀元上打上各種記號。兩種模式同時並存，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兩者此消彼長：初時多數被熔鑄，少數被打上印記；後來更多的被打上印記了。這種有印記的銀元，錢幣學上稱為爛板銀元（chop coin），它的形成是由於銀元需要按照中國傳統銀錠按重量流通，同時也需要中國錢莊的成色保證，可以說是中西貨幣制度相結合的產物。

傳教士對爛板銀元在中國的流通有較詳細的記載。衛禮賢原名為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來中國後取名衛希聖，字禮賢，亦作尉禮賢。1873年10月10日出生於斯圖加特（Stuttgart）——符騰堡（Wurttemberg）王國的首府。父親是圖林根（Thuringian）的手工業者，身為家中長子的他是魏瑪差會（Allgemeiner Evangelisch-Protestant Missionsverein）的傳教士。他以一名傳教士的身份來到青島，後辦教育、醫院，探究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學西播”的功臣，而在他57年的生命裏，有20多年是在中國度過的。衛禮賢對中國人製作出爛板銀元提出自己獨到的看法：西方銀元雖受到沿海商民的歡迎，但是在一些地方，“交易也並不總是誠實的”。每個商行都有自己的小戳子，用於在銀元上打戳記，為其真實性作證。但在這個過程中，少量的銀子就被這些商家刮下來自肥。那時候，你可以發現銀元上佈滿了戳記，這些銀元毫無疑問是真的，“但太多的戳記已把大約百分之二十的重量和價值剝去了”。<sup>③</sup>

美國傳教士何天爵（Holcombe Chester），1869年來到了中國，在北京負責公理會所辦的學校，1895年回國，同年出版了《真正的中國佬》（*Real Chinaman*）一書，書中的例子更是爛板銀元的生動寫照：

① 《銀圓上的戳記》，《金融時報》（北京）2008年1月18日。

② “嘉慶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方維甸片”，“嘉慶朝軍機處錄副奏摺財政類”1857卷第7號，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③ [德]衛禮賢（Richard Wilhelm）：《中國心靈（精神）》，王宇潔等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公司，1998年，第345—347頁。

中國的生意人在辨別其本國銀錠的成色方面有一雙異常犀利的眼睛。墨西哥鑄的銀元與中國的銀錠相比很不相同，它沒有中國商人所習慣辨認的那些符號和綫紋。雖然它們自己並不能說明，但中國商人總是模模糊糊、疑神疑鬼地相信，類似墨西哥鑄銀那樣的外國貨幣肯定是用一定比例的合金鑄成的。因此，他們寧願把這些東西搗騰成為自己所喜聞樂見的原始形式。這樣的話，只要瞄一眼，他們立刻就能夠判斷出其真正的價值如何。除純色的銀錠之外，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接受、認可或者支付其他任何形式的貨幣。

南方沿海的港口城市是墨西哥和西班牙銀元最初流入中國的地區。本來，這些銀元的流入是為了向當地居民證明，它們所代表的貨幣是堅挺可靠的。然而最終的結果卻很不妙：它們或遲或早都被無一例外地投進了重新鑄煉的熔爐。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在於這些沿海城市形成了一個風俗：當地的錢莊和銀號總要把它們所經手的所有銀元打上自己商號的印記，以作為負責定額兌換的信用標誌。於是，這種作法陳陳相因，家家仿效，每家商號都在經手的銀元上面打一個信用記號，如此重重疊疊、反反覆覆，一塊銀元很快就變得千瘡百孔，面目全非，難以辨認。它們在顯然不能按塊計算以後，還可以憑重量流通一段時間。而下一步等待它們得最終命運，便是進熔爐。

數年之前，一位很有名氣的美國女士在廣東遊歷時，希望憑信用卡（筆者按：應為外商銀行匯票）在當地的錢莊取500元的墨西哥鷹洋，以作購物之用。但是錢莊老闆向她建議，最好不要帶着錢去做現金交易。她可以給每位商人出具一份自己的購物證明，然後錢莊老闆再從帳戶上扣除她的全部花費。夫人拒絕了這一建議，還是願意自己帶上錢去買東西。於是錢莊老闆按照要求，從一個麻袋中倒出夫人所需銀元的數目，讓她自己再核實一下是否有誤。擺在面前的墨西哥銀元無異於一堆廢銅爛鐵：其中沒有一塊能夠稱得上是完整的銀元，其價值也只能按照實際重量計算。然而，據說那還是在廣東所能夠得到“最完好的墨西哥銀元”。<sup>①</sup>

而1880年代時，一個德國人在廣州看到錢商聽聲音辨別銀元真假後，“一轉眼錢商已經給銀元蓋了戳，以此保證其純正”。<sup>②</sup>而實際上，就算是當時著名的外商銀行匯豐銀行，也將市面上的爛板銀元收集後，以貸款或公債資金的方式發放給清政府。<sup>③</sup>

而從錢幣學的角度來看，目前在西班牙銀元、墨西哥銀元、日本銀元、中國龍洋、法國站人、菲律賓銀元、孫中山開國紀念幣等銀幣上都發現了爛板銀元，上面多為一些一字至四字的戳記，為一些錢莊、商號、機構等的代表符號，也有一些吉語，甚至有“提倡國貨”等政治口號。<sup>④</sup>

① [美]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真正的中國佬》，鞠方安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年，第239—251、262頁。

② [德]恩司諾（A. H. Exner）：《清末商業及國情考察記》，[美]熊健、李國慶譯，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第10頁。

③ 徐義生：《中國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1853—1927》，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頁。

④ 傅為群：《銀元上的戳印》，《都會遺踪》（上海）2008年10期；郁祥楨：《淺議銀元上的銅印戳記》，《上海錢幣通訊》（上海）1989年第12期。

## 五、民國時期爛板銀元的流通和收回

民國時期，爛板銀元基本上已不在市面上流通，但仍然會有少部分區域或突發情況使一些爛板銀元流入市面。

晚清民初時，一些人家依舊存有此種銀元，如一份判詞就說：“工人存工錢於主家，以圖積少成多，尋常事也。主家財力艱窘，因而聳允僱工代為存積，亦尋常事。存之愈久，積之愈多，清還愈難，此尤勢所必至之事。據呈該民在胥益芳茶館跑堂，每月工錢一千五百文，積有二十餘千。並有爛板花邊兩元，今向取不付，竟被吞沒，又被逞凶等辭。胥益芳心殊不良。”<sup>①</sup>

民初湖南有還有斫銀元，就是用一個金屬硬模在銀元表面打一印記，這樣被打印記的銀元是不受人喜愛的，它的價值要打折扣，它的流通地方只限於某一城或某一縣。<sup>②</sup>即使是流通，人們對使用蓋滿印記的所謂“爛板”銀元也有貼水要求。<sup>③</sup>

1924年9月，孫傳芳軍隊攜帶大量的爛板銀元進入浙江，商家拒收，衝突四起。軍方商請杭州總商會，通告各商號一律收用，並允將來由公家照制幣收回。此種銀幣先後經杭州中國銀行、浙江地方銀行收兌十餘萬元，餘幣於1925年2月由杭州總商會辦理收兌，全部送到造幣廠熔鑄成新幣。<sup>④</sup>

民國時期爛板銀元的最終結局都是投進熔爐，或鑄成新銀元、或鑄成銀錠、或鑄成首飾。《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有記載鑄成新銀元的情況，如武昌造幣分廠廠長蔡康曾請示上級外國銀元可否一律照收改鑄，可為例證：“則福建、江西、湖南等省所用之爛板銀元，向以人洋、鷹洋、日本洋居多，若不悉予改鑄，則此項惡幣勢必仍舊流行，貽害市面……”<sup>⑤</sup>至於銀錠方面，也是將爛板銀元收集起來由公家重鑄，如衡陽錢業的領導機關光緒二十一年設立的行會組織——國寶堂，民國四年改名為錢業公所，由各錢莊出資，由祥孚、致和、正大、祥源凡家大錢莊控制，錢業公所主要任務，一是每日七時召開各莊掌櫃先生商定兌換比價，存放款利息和匯水（匯費），並將議定的銀錢行情掛牌公佈，並印發全城，供商店行號參照執行。二是設鑄爐三座，將各莊的爛板銀元、銀毫子和散碎銀子，鑄成50兩一錠的元寶或銀條，加蓋火印，供各錢莊保存或駐莊抵匯。進出銀錢均由設在該所正廳的“天平寶”（公平秤）過秤為準。凡鑄一錠需收光洋九元費用。<sup>⑥</sup>至於首飾方面，民間一些商行將之收集後轉送銀樓熔鑄製成首飾，這種事例在南方各地很多，如：

清末，李昇如、躍彩兄弟等五人，隨其父母由湘鄉（現雙峰）遷居來邵，開設水酒作坊於城內東直街（姚家巷子隔壁），招牌名永大星，專買水酒與水粉，兼營香燭等雜貨。而以粉糟與酒精餵豬。不僱請外人，純係家庭成員操作，屬生產銷售型的槽坊形式。最初是以勞動收入為主，大家庭中儉樸成風。到了二十年代，其第二代人李湘初、

① [清]許文瀾：《塔景亭案牘》，俞江點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3頁。

②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長沙市委員會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美國駐長沙領事詹森報告書（二）》，《長沙文史》第16輯，2000年，第244頁。

③ 張惠信：《中國貨幣傳奇》，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7年，第156頁。

④ 白益民：《三井帝國啓示錄——探尋微觀經濟的王者》，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6年，第395頁。

⑤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金融，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46頁。

⑥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衡南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衡陽文史資料》第1輯，1989年，第94—95頁。

義初、麟瑞、獻瑞相繼成長，除繼續經營槽坊雜貨外，開闢了新的業務，收買、兌換“爛板”、“雜板”銀元及銀元銅元互相交易，從中賺取“銀水”，也就是“爛板”、“雜板”銀元與“光洋”之間的差價。他們將收到的很難再在市面流通使用的“爛板”銀元賣給銀樓作為打製首飾原料，這樣就使永大星成了當時邵城唯一經營雜牌銀元的專業戶。由於他們認真鑽研這項業務，竟成為市面上鑑別真假銀元、評定銀元成色的權威。有些人對銀元的真假有懷疑者，都得到永大星請“麟胖子”鑑定後才放心，於是永大星之名大著。<sup>①</sup>

不過，到了晚清民國時期，如沒有特殊情況，民間一般不再流通爛板銀元，如流通也要付出貼水的代價。但是，仍然有由金融機構在銀元上加蓋的習慣，只不過此時已改用軟蓋，也就是在戳記上塗上墨水，加蓋在銀元上，一經流通墨水就會塗去。

圖1 爛板銀元



① 王梅初主編：《肝膽照人：朱有道先生紀念集》，1999年，第185頁。





## 結語

爛板銀元的出現突出了政府和市場（民間）的貨幣關係、相互的競爭，以及貨幣本身的規律性發展。首先，它是市場貨幣對政府貨幣權的爭奪，因為本來白銀的財政性稅收是由政府以農業稅或其他稅種形式進行的，每個縣都有臨時性的官銀匠。對於外來銀元，政府稅收是要將其改鑄為官銀錠，在此過程中獲得稅收，其中，官吏得以從中獲得收入，實現尋租的過程。但在市場上，錢莊或其他形式的金融從業者，以鑑別銀元的真偽為由，以加蓋或斬印的形式從而獲得對銀元在市場使用的支配地位，這是中國市場為甚麼最終只對於各種外來銀元情有獨鍾的原因，它深刻地說明了貨幣在經濟活動或市場行為中的自生性。政府和市場都是貨幣發行或創造的主體，但在中國，由於傳統的原因，市場始終對抗不過政府。

其次，在中國白銀核心型的貨幣體系的實現過程中，銀元的發展與爛板銀元的興敗有着密切的關係。首先，政府與白銀的關係是由銀兩向銀元過渡的，但後來當民國初年中國銀元開始佔據市場並得到政府支持時，爛板銀元便開始退出市場。更重要的是，銀行與銀元、錢莊與銀兩在市場形成相對對立局面時，政府站在了銀行和銀元的一邊。這也與銀元的本位幣性質、中國的外債與在華外商銀行有關，也更符合中國貨幣體系向本位幣過渡的經濟學規律。

第三，從1600—1935年，在晚清前，爛板銀元在貨幣市場上是有地位的。但自中國自鑄銀元後，其地位日益下降，最後成為純為鑄幣原料幣材。

第四，爛板銀元有貨幣學的意義，這種錢莊的鑑定實際上給銀兩制度開了日後公估的先河，從而促進了各地公估的建立，平、色、兌成為銀兩制度的三大法寶，保證了銀兩制度的運行。而從反面的角度來說，強調了中國白銀核心型的貨幣體系中確立本位幣的必要性和意義，這是貨幣自身運動的規律。

[責任編輯 陳超敏]